

流動的身份認同： 辜振甫個案探微

• 周文港

辜振甫在台灣光復後的六十年，在推動經濟改革、開拓外交事務、促進兩岸關係，既扮演執行者，亦扮演推手的角色，影響力舉足輕重；他的一生，見證着身份認同因時局、政治勢態、外交情況的不同而起變化。

學者黃紹倫、鄭宏泰指出，香港人每當遇上國家大事，都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當涉及資本主義制度、普世價值的時候，就會覺得自己是香港人。這種身份認同上的左搖右擺，心理上和認知上的模稜兩可，恰好反映華人、華僑長期存在流動的身份認同問題^①。事實上，這種情況不囿於香港，在台灣、海外華僑或華人身上也經常出現。本文旨在以辜振甫為例，從其家世、生平，以至台灣現代社會背景作起點，探究辜振甫個人流動的身份認同的演變過程、原因、最終確立何種身份認同，以及其生平行誼對台灣整體身份認同的影響。

推手的角色，影響力舉足輕重；同時，辜振甫的一生，見證着身份認同因時局、政治勢態、外交情況的不同而起變化。

辜振甫生於1917年。1940年在台北帝國大學(今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兩年後與首任妻子黃昭華結



辜振甫像

一 辜振甫生平

辜振甫在台灣光復後的六十年，在推動經濟改革、開拓外交事務、促進兩岸關係，既扮演執行者，亦扮演

* 本文乃2008年6月28日的香港歷史博物館「週末公開講座」發言稿的修正本；對於獲得主辦單位的幫助及與會人士的意見，特此致意。

婚，可惜黃在婚後兩年過世。1945年國民黨政府光復台灣之際，辜振甫因牽涉台灣自治委員會事件（「台獨事件」）而入獄，身陷囹圄一年六個月。在獄中，他遇上了不少達官貴人，其中得到板橋林家林熊祥的關顧，因而認識了第二任妻子嚴倬雲。出獄後，辜振甫與妻子一度到香港生活了三年；在連襟葉明勳打聽到國民黨政府對他的往事既往不究之後，辜振甫旋即回到台灣重新主持家族企業。

自1950年起，台灣開始實施土地改革、公營事業民營化、公地放領及「三七五減租」等經濟措施。身為台灣第三大地主的辜振甫，以土地換得水泥、造紙、農林及工礦等四家公營事業的股票。在得到各個大家族、大股東及政府的支持下，辜振甫在台灣水泥公司（台泥）從協理一直晉升到總經理兼董事長的位置。

由於自土地改革釋放出來的股票、債券等需要有一個正式的途徑進行交易，國民黨政府遂於1961年委託辜振甫籌組台灣證券交易所。此外，在大企業及政府的支持下，辜振甫取代大陸時代的商人領袖束章雲，出任首位本省籍的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手執政商之間的麥克風。為了使民眾安全地進行證券交易，辜振甫在1966年成立中華證券投資公司（即日後的中國信託投資公司）。從此以後，辜家的經濟實力使其很快便躍升為台灣五大家族企業之一。

1971年台灣的外交風暴迭起，出現信心危機及身份認同危機，辜振甫臨危受命，以商人代表的身份從事民間外交，成功從外圍鞏固國民黨政府的對外關係，協助化解了自國民黨退守台灣後一次重大的政治危機。

1988年，李登輝出任代總統後，成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委任辜振甫出任董事長。數年間，兩岸展開了兩次政治談判——「汪辜會談」，對兩岸關係的發展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自1995年開始，辜振甫亦先後四次以「總統特使」的身份，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的領袖級會議，是前所未有的先例。及後，由於李登輝的兩岸政策反覆不定，在二次汪辜會談後，兩岸在十年間再沒有進行正式談判。而辜振甫亦於2005年1月在台北逝世，享年八十七歲。

辜振甫的一生，對台灣的經濟、外交、政商關係，以至兩岸關係均有舉足輕重的貢獻。他所憑藉的身份，不單是商人領袖，他更有一些黨政頭銜，因而被冠以「紅頂商人」。

二 日治時期以來台灣人身份認同的變化

台灣自1895年起因清日簽訂《馬關條約》而淪陷。日本據台後，即以不同的步驟實施同化政策，而「皇民化」是主要策略之一；其採取的具體措施包括風俗改良、易服改曆、破除迷信、國語（日語）普及等，企圖改變台灣人成為「順良的日本人」，進行身份認同的清洗。在日本全面侵華之後，日本殖民當局即提出「治台三策」，包括「皇民化運動」、「工業化」及「南進基地化」；簡單而言，其目的是要將殖民地的人民改變為「真正的日本人」。其中，「皇民化運動」的主要內容包括：宗教與社會風俗的改革、國語（日語）運動、改姓名、志願兵制度。後兩者是較為徹底的做法，

日本據台後，即以「皇民化」為主要策略，企圖改變台灣人成為「順良的日本人」，進行身份認同的清洗。在日本全面侵華之後，殖民當局即提出「治台三策」，其目的是要將殖民地的人民改變為「真正的日本人」。

蔣介石時代所實施的軍法統治和威權統治，與日本殖民者統治時期的軍事暴力、法律暴力、差別待遇等，沒有多大差別。日本現代化的建設，對台灣人仍有吸引力，故部分人會對日本的統治產生懷念。

不單要完成上一階段的身份認同清洗，更硬要將台灣人拉入侵略者的身份當中。

1945年日本戰敗後，國民黨政府正式光復台灣，當時的台灣人民滿心期待回歸祖國。可惜，因處理糾紛不當而於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對台灣社會造成深遠影響。1949年，因內戰失敗而退守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為了鞏固其中國法統地位、應付外交需要，以及出於對曾受日本殖民統治六十年的台灣本省人的猜疑，創設了籍別類屬分類制度^②。這些臨時性措施對不同省籍的人士造成政治及文化上的待遇差異，引起台灣本省人的不滿。

國民黨施政者的種種作為，在威權統治時期尚能頂住異見者的反抗。但是，到了1971年台灣失去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後，台灣內部的中國法統意識形態，以至人民本身的身份認同均受到嚴重的衝擊。建制派與在野派開始展開台灣人身份認同的競逐，這種競逐更由過去的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分野，演變為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四大族群」的論述。這種爭奪更出現在社會運動及政權交替的層面上，引起「族群政治化」或者是「政治族群化」的問題。

根據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不同的政黨、大學研究所、智庫、文字傳媒、電子傳媒由1989至1999年期間所進行的「台灣民眾的自我定位與國家認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1989年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只有16%，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則高達52%；五年後，自認是台灣人的比例已反超前於自認為中國人的比例，而這種差距更一直擴大到1998年，自認為台灣人的比例高達58%，自認是中國人的只有27%；

到了1999年，自認是中國人的更低至不足20%^③。

不少被視為統派的台灣學者及公共知識份子認為，十一年間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出現了逆轉，除因為在野派的推動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當權者因個人的好惡及爭奪執政權的需要，在國家定位及身份認同問題立場上的搖擺所造成^④；這或許可以解釋光復台灣後的「大中國論述」何以在短短十年間迅速傾倒。

被視為獨派的台灣學者則另有看法。施正鋒指出，國民黨政府光復台灣以來，表面上是以共和式民主來使台灣本省人加以中國化，透過實施土地改革、國語政策、沒收偽產等方式，消滅日本統治遺迹、改變社會階級分層，以及想盡辦法打壓本土三個族群。而蔣介石為了安置二百多萬由大陸來台的軍公教人員，在國家機器大量起用外省人，引起差別待遇的爭議，讓台灣本省人強烈感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延續。蔣經國在任後期，雖一度大量起用本省籍菁英，但本省人只認為是樣板而已^⑤。這些論述，或許有助非台獨人士理解台獨持份者所存在的心結和不滿。

對不少台灣人而言，1945年開始的蔣介石時代所實施的軍法統治和威權統治，與日本殖民者統治時期的軍事暴力、法律暴力、差別待遇等，沒有多大差別。兩者比較起來，日本以一個勝利者的姿態佔領台灣，加上其現代化的建設，對台灣人而言仍有吸引力，故部分人會對日本的統治產生懷念，在身份認同上亦有可能出現一些掙扎與矛盾。一句話，台灣的身份認同問題與台灣的政治前途一樣，在現實中一直處於各方競逐的局面。

三 營商模式與身份認同

辜振甫本人具有的家族營商傳統和商人靈活處事的血統，可見於1950年代開始台灣不同階段的經濟及社會改革之中。1950年代台灣的土地改革，不但牽動了地方上的既得利益，更直接介入基層的利益分配，劇烈地影響着台灣島內不同階級的社會流動。辜振甫以及當時台灣三大家族（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高雄陳家），是少數不受農地改革影響仍能有力從事全國性工商業活動的人士。由於他們的主要資產就是土地，國民黨政府要讓土地改革取得成功，就必須取得其支持，故給予他們主導權的地位。在公營事業民營化的過程中，以土地兌換民營化事業的股票是按比例來進行的，故持有股票的多少便反映着這個家族在台灣的影响力。以辜振甫最初只在台泥擔任協理的位置來看，其影響力遠遠不及其他三個家族；但由於他爭取到其他三個家族的支持及統治者的信任，加上遇到「三七五減租」農地價格暴跌此一機遇，遂得以扶搖直上，不但提升了自身的政經力量，更加強他對作為「中華民國國民」這種過去非常陌生的身份認同。

值得注意的是，辜振甫要在不同階段中收集公營事業的股票，從而擴大本身的影響力，除了需要擁有雄厚的財力外，亦需要對當權者有所信任。當時土地改革的實施，是國民黨政府以30%公營事業股票、70%實物債券作為賠償。由於國民黨過去在大陸的金融財政破產的經驗，大部分台灣人無法相信國民黨政府有能力在十年內兌現債券，因而紛紛在短時間內以極低價錢拋售手上股票套現；而辜振甫恰恰在此刻收購，不得不令人佩

服他的獨到眼光和投資勇氣；而其成功之道，就是對當權者有充分的信任，同時服膺於它塑造出來的身份認同。兩者缺一不可。

隨着手上的股票不斷累積，以及當權者欣賞辜振甫的忠誠，因而委託他主持台灣新式股票交易所的組建。組建之初，辜振甫成立了中華證券投資公司，成為他沾手金融事業之首舉；也就是這一步，奠定了辜振甫及其家族日後稱雄台灣金融服務業市場的基礎。

四 現代化與認同問題

金耀基、白魯恂 (Lucian W. Pye) 等認為，二十世紀之初中國人面對長期積弱，飽受外國的欺凌，迫使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一步步走到揚棄傳統文化的立場，形成新興的民族主義；這種新興的民族主義並非建基於自身文化的驕傲之上，反而陷於自卑之中，使當時的中國人在伸張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時，失去了文化的支持，轉移透過現代化這個途徑去尋找新的「理想的認同」^⑥。而一般人看待現代化，往往會以西方工業化程度作為標準，尋找個人發展的突破；而現代化過程中的成功或失敗的經驗，將直接影響其對身份認同的取態。

辜振甫大學時代唸的是政治學，他與父親辜顯榮一樣，具有相當強烈的求變求進精神。他不單從不同地區引入新水泥技術，以提升台泥的產能來取得台灣本土市場的主導地位；為了應付台灣經濟在1970年代起飛的需要，更整合了國民黨政府大陸時期的股票交易所與日治時期台灣株式會社、債券制度的經驗，再加上美國現

辜振甫最初只在台泥擔任協理，但由於他爭取到當時三大家族的支持及統治者的信任，加上遇到農地價格暴跌此一機遇，遂得以扶搖直上，不但提升了自身的政經力量，更加強他對作為「中華民國國民」這種過去非常陌生的身份認同。

在現代化與身份認同問題上，辜振甫選擇多元化的進路去尋求現代化，當中包括美國的西方經驗、日本的東方經驗及自身制度的改良，這種做法較其父辜顯榮全盤押注到日本而言，視野和目光要遠大得多。

代化的股票交易制度，建置了台灣的新式股票交易所。這些都充分反映出辜振甫對推進現代化的承擔。

在家族層面上，辜振甫比一般台灣人更貫徹「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做法，他將大女兒及兩名兒子送到美國唸大學、MBA及博士；這反映辜振甫希望子女在外邊學到現代化的知識和經驗，然後帶回來好好發揮，促進家族及社會現代化的發展。

在現代化與身份認同問題上，辜振甫選擇多元化的進路去尋求現代化，當中包括美國的西方經驗、日本的東方經驗及自身制度的改良，這種做法較其父辜顯榮全盤押注到日本而言，視野和目光要遠大得多。促進社會現代化，對個人的社會影響力、對鞏固社會就身份認同的看法，均具正面意義。

有研究發現，華人社會的身份認同問題呈現兩種群體、兩種不同的流動性。流動能力較弱的人，有身處現代化城市的優越感，會固守去國族化論述，視傳統或大陸為落後與不文明，在不同層面上產生排距；而流動性較強的人，主張與傳統或大陸有較多的認識及聯繫，對國族化論述有相對務實表現^⑦。辜振甫以文化中國為基礎，以多元進路的方式務實地進行個人及社會的現代化，令處於不斷變動當中的自身及台灣人尋找如同金耀基所說新的「理想的認同」，對社會產生很大影響。

五 台灣外交弱勢與身份認同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一直面對中國法統及

外交競爭的挑戰。台灣人因受國民黨政府連番的政治運動所影響，1950至1960年代一直持守着「中國正統、反攻大陸」的身份認同及意識形態。但在1970年的保釣事件、1971年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事件後，國民黨政府不但在台灣內部的統治權威上受到很大的挑戰，就連外交國的數目亦出現骨牌效應式的西倒（轉而與北京建交）。一時間，在台灣社會內部及不少在外的留學生當中出現了對國民黨政府的信心危機，因而亦產生身份認同上的迷失。而當時台灣內部出現的問題不僅至此，更有反美、反日的中國民族意識，亦有在敵視北京日益巨大的解放台灣壓力下形成的台灣本土意識的抬頭；就連文學界，也引申出如鄉土文學論戰的出現。

當時，台灣的外交處於劣勢，本土民意及海外青年對宗主國的取態亦出現逆轉，對台灣的前途憂心忡忡。加上當時蔣介石的身體不佳，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又未有真正執政；台灣的一切都呈現不穩定性，處於自國民黨退守台灣之後的一次最嚴峻的考驗。國民黨當局對社會上的信心危機及身份認同危機，一方面推出「十大建設」讓台灣人明瞭發展方向，穩定人心；另一方面，則倚重辜振甫的國際網絡，開拓民間外交，從外部做鞏固民心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當北京取代台北加入聯合國後，當時台北的外交系統仍認為，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民黨政府採取以德報怨的方式處理戰爭問題，日本應不會主動與台斷交，可惜事與願違。1972年台日斷交後，辜振甫即利用其父辜顯榮留下的日本人脈關係^⑧，與日進行溝通，一手促成日本駐台大使宇山厚與外交部長沈昌煥的

六 兩岸關係與身份認同

會面，會後兩人協議透過成立亞東關係協會，以保持台灣與日本的聯繫管道，突破台灣的外交窘境。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 (Richard M. Nixon) 訪華後，台美斷交，辜振甫又以工商協進會的名義組團訪美，游說國會制訂《與台灣關係法》，並積極聯絡美國政要，如當時的眾議員福特 (Gerald R. Ford)、加州州長列根 (Ronald W. Reagan) 等，使台灣得以繼續取得美國的「祝福」，在信心危機及身份認同危機中得以喘定。

曾任台北駐日代表的馬樹禮提到，台灣之能加入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 (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PBEC)、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 及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都是靠辜振甫向日本爭取協助而成功闖關的^②；這或許能解釋1980至1990年代，辜振甫先後代表國民黨政府參加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年會，及後更自1995年起連續四次，以「總統特使」身份代表台北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原因。如此種種，既能凸顯辜振甫「經濟外交家」的身份，亦能凸顯其危機處理的能力。辜振甫對國民黨政府的忠誠度之高，亦可見一斑。

由此可見，辜振甫對於保衛國民黨政權、「大中國論述」，確實下了一番苦功，同時對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影響巨大。然而，台灣內部日後出現的青年人對威權統治持續不認同，加上日本、美國利益的積極介入，產生及催化台獨運動的發展，恐怕非國民黨政府及辜振甫能阻止得來。

1970年代以來，兩岸的外交戰高潮迭起，辜振甫作為台灣的經濟外交代表，在國際上長期與大陸針鋒相對，一直是大陸所忌憚的人物。隨着蔣經國在任後期放寬大陸政策，而李登輝亦在民意壓力下，展開兩岸的公開談判。

1992年，海協、海基兩會代表曾在香港舉行事務性會談，當時彼此觸及「一個中國」的主權問題，出現各自表述的局面；大陸方面指出「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乃是次會談的成果，海基會並沒有表示異議，此一說法就是雙方稱為的「九二共識」。及後，兩岸先後兩次在新加坡、上海和北京舉行「汪辜會談」。1998年第二次會談時，國共雙方觸及國家主權論述的底線問題；正當汪道涵指「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之際，辜振甫亦毫不修飾地作出「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在《波茨坦宣言》中清楚寫明台灣交還給中華民國」的論述；這種說法，後來他更在北京直接向江澤民主席表達。

辜振甫在大陸進行談判時，堅持了他作為「中華民國代表」的利益與立場，是第一位在內地的公開場合指「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人。他不但在談判桌上勇於捍衛己方利益，更能達至鞏固台灣社會主流對身份認同的立場。



1993年在新加坡首次舉行「汪辜會談」。

受「皇民化」教育影響的辜振甫沒有「半山」的身份，卻有策動「台獨事件」的嫌疑，而從日後國民黨與辜振甫之間的互動中可知，他之所以能脫穎而出，在於其社會地位的特殊性、貴人的舉薦、日後的忠誠與能力備受肯定。

辜振甫在大陸進行談判時，堅持了他作為「中華民國代表」的利益與立場，是第一位在內地的公開場合指「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人。他的勇氣，以至對台灣社會內部開始迷失於「我是誰」的問題時一度提供了答案。可惜，在李登輝的「兩國論」、「特殊國與國」關係，以至獨派陳水扁上台後將台灣定位為如新加坡般的「華人國家」、推出一系列「去中國化」舉動後，這種國民黨傳統「大中國法統」式的論述一度暫停。遲至國民黨第二次敗選、連戰以中國國民黨主席的身份會見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時，就意味着「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復活」。

辜振甫的優點，不但在於在談判桌上勇於捍衛己方利益，更能達至鞏固台灣社會主流對身份認同的立場；在兩岸關係層面上，更能夠為後繼者提供鑰匙，使馬英九重新奪回執政權後，能快速推進兩岸關係。辜振甫留給台灣以至兩岸和平的重要資產，可見於此。

七 複雜個性與絕對效忠

國民黨政府在光復之初，並未意識到透過大量起用菁英來爭取台灣人支持的重要性，只在縣市長層次委任本省人黃朝琴擔任首任台北市長，中央層面的職位基本上全由外省人所壟斷。這種做法，被台灣本省人將日據時期台灣人只能擔任貴族院議員、無人可擔任眾議院議員的事相提並論。

謝東閔、連震東、辜振甫等，被視為國民黨政府對扶植台灣本省人的「政、商樣板」，當中謝東閔、連震東等有「半山」的身份^⑩。而受「皇民化」教育影響的辜振甫，沒有「半山」的身

份，卻有策動「台獨事件」的嫌疑，而從日後國民黨與辜振甫之間的互動中可知，辜之所以能脫穎而出，在於其社會地位的特殊性、貴人的舉薦、日後的忠誠與能力備受肯定等因素。

提拔台灣本省籍的菁英，既有助於為「反攻大陸」事業輸送人才，最重要之目的還是回歸鞏固政權、培植支持者、防止離心三項。辜振甫作為家族利益的總代表，必然有個人及家族的利益計算在內；而國民黨政府的爭取菁英政策，何以開放至有空間吸納過去有「台獨事件」嫌疑的人士？究竟是一場冤獄，還是提拔菁英政策以用人唯才、不問出身的用人法則所主導？值得我們細意了解。

自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開始，與辜振甫有關的國家利益與家族利益已儼然成為共同體。加入中國國民黨，更是辜振甫人生的轉捩點。國民黨確實為辜振甫提供非常多的機會；同樣，辜振甫每每不辱使命；這可見辜振甫對國民黨塑造出來的身份認同有深刻的感情與堅持。「不斷輸誠，爭取認同」已成為辜振甫與國民黨之間的一個既有固定互動模式。

在利益上而言，光復台灣後的日本偽產，佔當時台灣的九成以上資本，而這些資本成為了國民黨政府的公營或黨營事業。絕大部分的資本操控在黨國之中，意味着只有服膺統治者的人，才有向上流動的機會。辜振甫以其特殊社會身份、貴人的推薦、個人能力，得到了國民黨的刻意栽培，成為台灣首批不具「半山」身份的本省人受重點培養的菁英。

受「皇民化」教育影響的辜振甫，加入國民黨初期感到難以適應，是可想而知的。國民黨在委以重任之前，給予其在有黨校性質的國防研究院學

習的機會^①，與其說是「洗腦」，不如說是增進彼此的溝通了解、互相認同。從其日後主持台泥業務、成為工商協進會理事長、組建台灣證券交易所、積極參與民間外交工作、代表台灣參與兩岸事務的談判，以至用領袖特使的身份出席不同的國際組織領袖級會議可見，國民黨對這位非政治官員、卻有明顯「紅頂商人」光環的辜振甫充分的信任。這正好反映辜振甫在政治上的絕對忠誠；否則，他無法得到統治者的信任。

蔣經國曾在出任行政院長之初，有意邀請辜振甫出任副院長之職，惜被辜振甫婉拒^②。這個決定，或許包含了辜振甫較為重視個人與家族利益、以商人代表的身份從事民間外交較具靈活性等考慮因素。

辜振甫對於國民黨的忠誠，可說是絕對的。在北京的強大經濟及政治誘因驅使下，辜振甫個人並沒有動搖，反而改由家族繼承人辜成允主動出擊，率領台泥到大陸投資。這或多或少反映着，辜振甫明白自己的政治包袱難以在有生之年有所突破，同時出於要為未來家族利益作出考慮的商人性格；畢竟，商人政治上有「多邊押注」的傳統。

經過兩次的談判後，「汪辜會談」已成絕響。台灣在2000年的政黨輪替後，辜家在台灣的政、經地位更有滑落的情況；辜顯榮的長曾孫、辜濂淞長子辜仲諒更因金融弊案滯留海外。而近年能令辜家吐一口烏氣的事，就是辜振甫的次子辜成允在內地的水泥生意衝上了中國三大水泥公司的地位。2008年國民黨取回政權之後，辜成允跟隨副總統當選人蕭萬長出席在海南舉行的博鰲論壇，蕭萬長更當眾將辜成允引薦給胡錦濤主席認識^③，這反

映辜家的政商關係能以國民黨的統治再作延續，這亦是因辜振甫對國民黨政權的忠誠、對身份認同的堅持而留給辜成允的遺產，格外顯得彌足珍貴。

八 辜振甫身份認同的象徵意義

辜振甫以其受日本「皇民化」教育的背景，在光復台灣後協助國民黨政府推動一系列經濟及外交政策，當中在土地改革、公營事業民營化、民間外交、兩岸談判中更扮演穿針引線、積極參與的角色，在不同階段的身份認同危機中站穩與統治者同一陣線的位置，更能打造新的身份認同論述，給台灣人帶來啟示，對台灣社會內部影響深遠。

辜振甫在政商界的積極兩線參與，與江炳倫的族群與國家衝突發展原因中資源競爭和利益團體說內的形態^④，非常吻合，反映在資源競爭與利益團體中，會促使身份認同的程度產生變化。而辜振甫在台灣證券交易市場、個人事業及家庭上所作的努力，亦印證了現代化會對身份認同產生影響。此外，辜振甫在經濟外交、民間外交所付出的努力，對維繫現有政治力量產生重大作用，可見國際影響對凝聚社會內部的身份認同亦具有正面作用。

身處變動的社會，社會與個人的歷史會受各種不同甚至矛盾的國族論述競相書寫。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矛盾的敘述，不必然與個別人士的往事配合，即能構成一幅多元化的圖像。從辜振甫這一個案可以知道，身份認同是流動的，會因時局、政治勢態、外交情況的不同而起變化。

身份認同不是社會成員被動地接受某個身份的過程，而是個體主動地尋找一己社會行為意義，從而建構自己的身份。辜振甫帶領其家族、台灣人跨越不同環境和時代的挑戰，在不同的時候選擇身份認同的不同論述，以保持台灣社會發展不墜。

梁世榮指出，身份認同是個複雜的概念，這不是社會成員被動地接受某個身份的過程，而是個體主動地尋找一己社會行為意義，從而建構自己的身份^⑧。辜振甫的過人之處，不單在於能完成上述目的，更能帶領其家族、台灣人跨越不同環境和時代的挑戰，在不同的時候選擇身份認同的不同論述，以保持台灣社會發展不墜。而他在各方面的身份認同表現，亦甚具標誌性。而對於台灣目前爭相取得身份認同主流的各方，以至銳意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的中央政府而言，辜振甫的個案具有相當的借鑒意義。

註釋

① 鄭宏泰、黃紹倫：〈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九七前後的轉變〉，《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2年10月號，頁71-80。

② 王甫昌：〈由「中國省籍」到「台灣族群」：戶口普查籍別類屬轉變之分析〉，《台灣社會學》，2005年總第9期，頁59-117。

③ 參見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頁，www.mac.gov.tw/index1.htm，2008年2月瀏覽。

④ 龍應台曾指出，民進黨以「愛台灣」口號奪取政權，因為這個口號有號召力和正當性。最後更從口號變成命令，從命令變成國家標準，藉以鞏固政權。龍應台：〈向核心價值邁進，超越台灣主義〉，《明報》，2004年5月12日。此外，南方朔精煉地綜合民進黨利用歷史傷痕挑動族群、製造政治兩極化、從而逼迫選民作出決擇的選舉模式。南方朔：〈台灣的悲情與危情——撕裂的大選撕裂的台灣〉，《明報月刊》，2004年總第460期，頁19-21。

⑤ 施正鋒：〈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族群政治〉，《台灣民主季刊》，2007年第4期，頁1-26。

⑥ 金耀基：〈中國現代化的動向〉，載彭懷恩、朱雲漢主編：《中國現代

化的歷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頁3-34；金耀基：《中國現代化與知識份子》（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8），頁13-23；Lucian W. Pye,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za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Chinese University Bulletin*, no. 22 (1991): 12-29.

⑦ 馬偉傑：〈後九七香港國族身分變奏〉，《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總第29期，頁93-199。

⑧ 辜顯榮在世時就與日本政界廣結善緣，甚至是跨代進行，這種關係一直延續至今。與辜振甫來往密切的包括岸信介、小淵惠三、佐藤榮作、福田糾夫、森喜朗等前首相。參見〈一代儒商·風雲89載·瀟灑一生〉，《聯合報》，2005年1月4日。而辜振甫對日本的認識，更不囿於語言、文字、文化或人脈關係，就連日皇裕仁於1970年代都向這位台灣人授勳，日皇明仁亦請他出席日本王室的「園遊會」。

⑨ 馬樹禮：《使日十二年》（台北：聯經出版社，1997），頁231。

⑩ 「半山」的身份，意思是台灣本省人曾回到內地生活或服務政府。

⑪ 陳劍秋：〈一代儒商——辜振甫齋志以歿〉，《中外雜誌》，2005年總第456期，頁29-38。

⑫ 黃天才、黃肇珩：《勁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紀實》（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357。

⑬ 在是次會面中，胡錦濤主席對辜振甫有以下評價：「他老人家對兩岸和平的貢獻，是讓人深深懷念的。」〈胡錦濤：代我向馬先生問好〉，《中國時報》，2008年4月13日。

⑭ 江炳倫：〈族群——國家衝突及其解決之道〉，《亞洲研究》，2001年總第38期，頁6-24。

⑮ 梁世榮：〈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理論與研究方法的反思〉，載劉兆佳等編：《華人社會的變貌：社會指標的分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1998），頁190。

周文港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博士
研究生